

书信背后的大师

■ 罗熙临 刘妍

木心先生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是了，被遗忘的是濯手素心，缓慢从笔尖流淌下来的那一撇一捺，一封封信件和黄色牛皮纸包裹着的张张墨迹。

比起著作、论文、学术成果，书信、日记往往更加细腻平实、富有人情味，透过留存在纸页上的、未经雕琢的笔迹，我们仿佛可以穿过时间的河流，横渡到昔日大师的时代，与他们面对面。

这些书信记录了昔日大师与友人的对谈、对亲人的思念、对生活的思考。人们常说：“见字如面”。透过一段段或长或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位旧人，或微笑，或沉思，缓缓走过他的人生，串联起时代的脉络。

读起这些书信，我们心目中的“大神”似乎多了一些烟火气息，而大师辈出的时代也离我们不再遥远。

致家人：一生牵挂在汝身

亲情是一根古老的藤，承载着对岁月的眷恋。无论身处何地，我们心心念念着的永远是家人，与此同时，我们亦被他们时刻牵挂着。

天气渐凉，一句“一年冬近又添衣，平淡江山，欲问亲安”便是思亲；玉盘高悬，一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是思亲；佳节将至，一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也是思亲。

旧时，人们总是习惯将思念与问候藏在简短小诗，几页尺素，经过一路车马颠簸，方能将情谊传达。如今，网络延伸了我们的器官，很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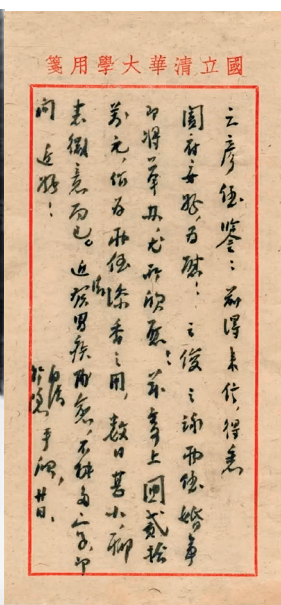
人再用写信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诉说相思，人们习惯了在键盘上敲下文字，霎时间便从手底传到了对方的终端。但是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遗忘了。

有这样一位先生，他看过美丽的荷塘月色，做过清华的中文系主任，参加过热血的新文化运动，也拒绝过美国的救济粮。

他，就是朱自清。晚年的朱自清贫病交迫，生活拮据，就在这个时候，侄儿朱之彦又即将成婚，送来请柬，于是他修书一封，并随信附上二十万元国币以表心意。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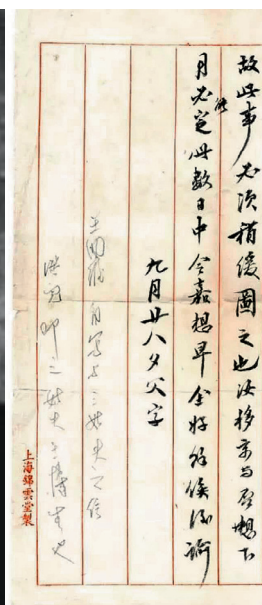
朱自清



朱自清给朱之彦的信



王国维



王国维给儿子王潜明的信

之彦侄鉴：

前得来信，得悉阖府安好，为慰！之俊之詠两侄婚事即将举办，尤所欣慰！兹寄上国币贰拾万元，作为两侄添香之用，数目甚小，聊表心意而已。近清发胃疾甫愈，不能多写，即问近好！

其实此时距离朱自清离世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在疾病和社会情势的双重折磨下，他自己的情况已然不容乐观。当时正处货币贬值，贰拾万元国币的确数量不多，但在佩弦自身而言，这份情意着实深重。

清华人文学科的另一位宗师、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先生，也曾在书信中透露出与端方严肃的宗师形象不相符的一面。在给儿子王潜明的信中，他写道：

潜儿入目：

前自津归，宝宅有喜事，虽往应酬，未能将汝事谈及。后则孙慕韩有回南及组阁之信，顷方在进行之中，决不能将此等事属之，故此事必须稍缓图之也。汝移京与否，想下月必能定。此数日中令嘉想早全好。

这封信充盈着父亲的责任与慈爱。当时王潜明居住在上海，王国维先生希望通过孙慕韩的帮助让儿子回到北京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询问了孙女令嘉的恢复情况。但不幸的是，此信写后不久，王国维先生的长孙女夭折，年仅两岁半，随后长子王潜明也在父亲王国维之前先离开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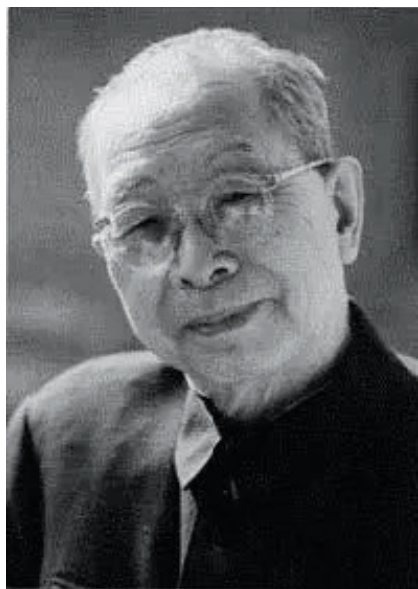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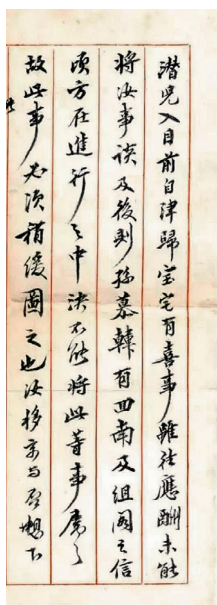
文字承载的不仅有飘零情绪，也有逝去的历史，家书有时也是反映时代现实的一面镜子。

吴恩裕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是我国著名的文学作家。早年，他给原配夫人宋淑青写了这样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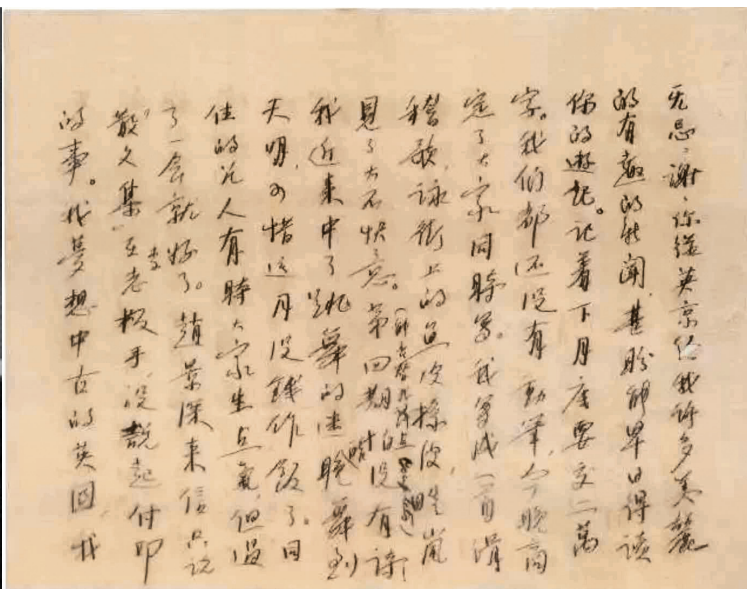
淑青：

我又干了，务请代借五元至十元，以急燃眉，至盼至感！让吴洛等着拿回来。今天没了吃饭钱，明天有人从上海来，真不得了。

短短几句话里，没钱吃饭的窘迫跃然纸上，甚至逼得一位文学家拉下脸向前妻借款请客，困顿时局中困难的生活流传到今天，生出了一些令人莞尔的趣味。



罗念生



罗念生给柳无忌的信

信

致友人：萍水相逢乃幸事

亲情是天生而不可逆转的，友谊则往往是萍水相逢的偶然。

在鸿雁传情的年代里，写给朋友的书信是最多的，“笔友”的关系则是遥远又亲密、温柔又疏离。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或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书信传情传物，比起亲情的抒发，与友人的交流范围更加广大——寒暄、关心生活的亲昵，交换诗文的意趣相投，日常的请托等等，都在朋友关系的底衬上顺理成章。

在与朋友的书信交往中，我们可以从放松的语气中看出大师生活中许多可爱细节与真实的想法。

专研古希腊文化与文学的罗念生先生，曾向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先生寄出这样一封信函：

无忌，谢谢你从英京给我许多美丽的有趣的新闻，甚盼能早日得读你的游记。记得下月底要交二万字，我们都还没有动笔，今晚商定了大家同时写。我写成一首滑稽歌，咏街上的鱼皮橡皮，瞪岚见了大不快意。第四期怕没有诗！（能否帮

我译点 couples）。我近来中了跳舞的迷，昨晚舞到天明，可惜这月没钱作饭了。同住的几人，有时大家生点气，但过了一会就好了。赵景深来信只说《散文集》在李老板手，没说起付印的事。我梦想中古的英国，我梦想剑桥，不知那一世我才能到那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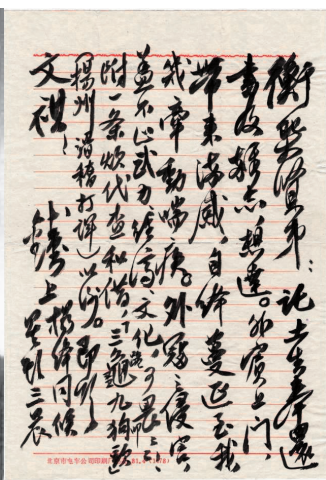
这封信中，罗念生先生显得活泼而愉快：他先聊了聊由柳无忌先生的父亲柳亚子先生主编的《文艺杂志》的供稿情况，然后说到热爱跳舞的，用完了做饭的预算，最后说到曾经请托的书籍和自己对英国、对剑桥大学的向往。浏览这封信，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编著了《论古希腊戏剧》《古希腊汉语词典》的勤奋大师，他在信中和每一个清华学生一样，会拖稿，也会在DDL（deadline）之前求朋友帮忙；会和舍友有矛盾，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矛盾；会有梦想的大学，也会因为梦想的遥远而感到悲伤。

当大师与好友交流时，他们不再谈论学术问题，而是谈论生活小事；也不再用逻辑和术语构造一篇文章，而是更加活泼可爱。

钱钟书先生在大家的印象中是《围城》的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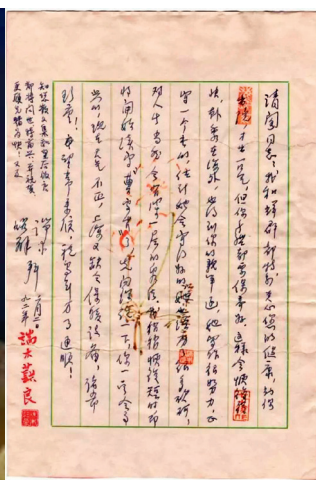
钱钟书



钱钟书给董衡巽的信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给赵清阁的信



胡适

利、《谈艺录》的严谨、《管锥篇》的深刻，但是在书信中，他流露出了有趣而幽默的一面。在寄给文史学者董衡巽先生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衡巽贤弟：

托土生奉还书及杂志，想达。外宾上门，带来流感，自绛蔓延至我，几牵动喘疾。外寇之侵害，盖不止武力、经济、文化，可畏可畏！附一条，烦代查和借，“三龟（跪）九狗（叩）头”以谢。

当然，和友人的交流也不仅仅是打趣玩笑，关心、呵护、情谊，都是友谊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著名文学家端木蕻良在写给著名女作家、编辑家、画家赵清阁女士的问候信中，深情表达了自己的关怀：

清阁同志：

我和耀群都特别关心您的健康，到你出院，才出一口气，但你千万都要保养好，这样会恢复得快，韩秀在海外，也得到你的亲笔函，她写作很努力，正写一个长的，估计她会写得好的。她也经历了很多坎坷，对人生当然会有深一层的看法。我稍稍恢复短时，即将开始续写《曹雪芹》了，先向你说一下，你一定会高兴的。现在天气不正，

上海又缺乏保暖设备，诸希珍重，望常来信，祝写作万事通顺！

知您《散文集》和《皇后饭店》都将问世，特高兴，并祝贺。更愿先睹为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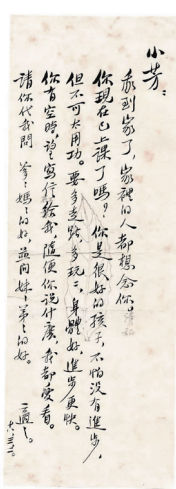
除了这些或交心或传情的书信，在清华人的书信史上也有“超出想象”的友谊往来。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曾有一封寄给友人陶孟和先生生长女陶维正的信函：

小芳：

我到家了，家里的人都想念你。你现在已上课了吗？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没有进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体好，进步更快。你有空时，望写信给我，随便你说什么，我都爱看。请你代问爸爸妈妈的好，并问妹妹弟弟的好。

“小芳”其人便是陶维正。此信寄给友人之女，言语朴实恳切，真诚地令人动容，充满了胡适对于陶维正的疼爱、关怀和期许。不说一般长辈叮嘱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报效祖国”之类的话，反而劝说孩子多玩玩，与孩子交流也如同同辈，“忘年交”的情分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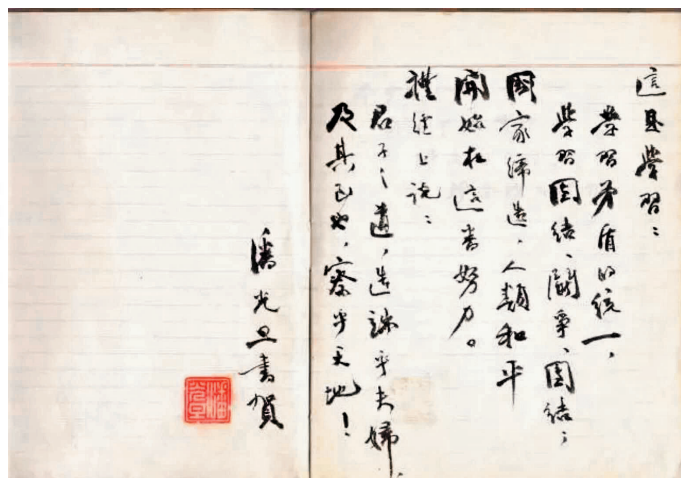
另外，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胡适作为新文



胡适给陶维正的信



潘光旦



潘光旦给新婚夫妇的贺词

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身体力行使用白话文、推广白话文，其勇气和底气可见一斑。

而潘光旦先生给一对在清华园相识、成婚的爱侣写下了这样的贺词：

这是学习：

学习矛盾的统一，学习团结、斗争、团结；国家缔造，人类和平，开始在这里努力。《礼经》上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时隔六十五年，不知道现在相识、相恋于清华园的同学们是不是还愿意用这样一段贺词激励自己的婚姻，但潘先生的可爱可亲，还是牢牢留在了当年新婚时的红皮笔记本上。

致事业：此生意义为追寻

泱泱清华，大师云集，亲情友谊是人之常情，而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始终还是在于对事业的不懈奋斗。

在通讯并不发达的时代，书信来往是公务交流的主要方式，墨迹上存留的是思考的痕迹、斟

酌的过程和事业的成果。这些事业大则关乎国计民生、社会变革，小则关乎一本书的出版、一篇论文的修订。事业无大小，而投入有深浅，大师之伟业，在乎投入之深、用心之极。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功臣，从他浩瀚的著述中，我们找到这样一封写给他的同学孔昭焱先生的书信：

希白大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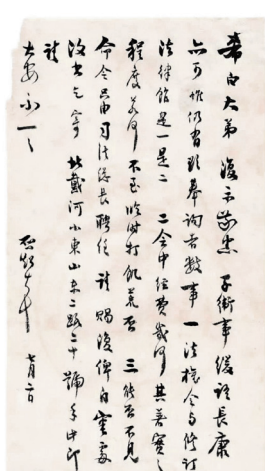
复示敬悉。子卫事缓语长康亦可。惟仍有欲奉询者数事：一法权会与修订法律馆是一是二；二会中经费几何，其著实之程度若何，不至临时打饥荒否；三能否不见命令只由习法总长聘任。请赐复，俾自审处。

信中所写主要是法务方面的事宜。因孔昭焱先生曾任两广法政大学堂教务长，著有《议会通论》《上海法权问题》等书，为法务方面的专家，因而在法律修订上向他咨询。两人结识于万木草堂，写信时正值中华大地巨大变革的1926年，从法务一点的讨论可见当时革新的盛况。

比起宏观革新的父亲，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的事业更加专注，对当下清华、当下北京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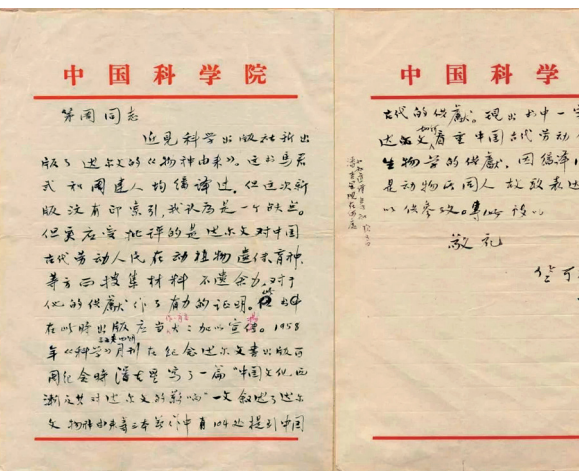
梁启超



梁启超给孔昭炎的信



竺可桢



竺可桢给童第周的信

更具体。梁思成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创办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的故事所有清华人都曾听闻。而他对北京城的影响，可从1949年9月写给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将军的一封书信中窥见。

1949年5月，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邀请梁思成、陈占祥等国内专家和巴兰尼科夫等前苏联专家组成工作组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梁思成和陈占祥二人在此期间拿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其主要思想是把北京旧城整体保护，新城择址新建，但却因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未被采纳。

这是一封极有名的信，信中提到“都市计划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有计划的分配全市区土地的使用，其次乃以有系统的道路网将市区各部分联起来”，“人民的首都，在开始建设的时候必须‘慎始’”，以及关于建筑师的职责——“建筑师是以取得最经济的用材和最高的使用效率”，和“居住者在内中工作时的身心健康为目的”等论述，至今仍为城市规划者提供思路和训诫。

向决策者上书时可体现观点，与学术同仁交流时也可体现自身想法。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教授，就曾在书信中就近见科学出版社新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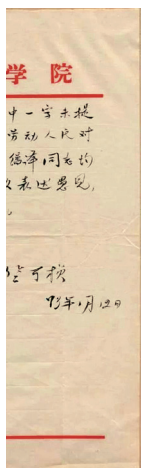
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即《物种起源》）提出批评：

第周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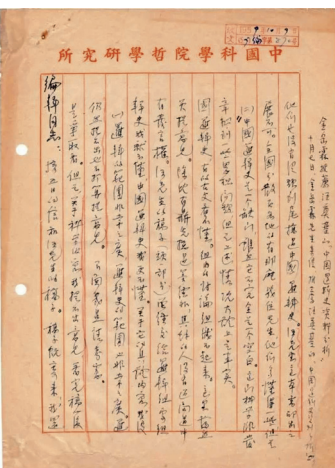
近见科学出版社新出版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这书马君武和周建人均翻译过，但这次新版没有印索引，我认为是一个缺点。但更应受批评的是，达尔文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动植物遗传、育种等方面搜集材料不遗余力，对于他的贡献作了有力的证明，此书在此时出版应当作一序言大大加以宣扬。1958年《科学》月刊（三三卷四期）在纪念达尔文书出版百周年纪念时，潘吉星写了一篇“中国文化西渐及其对达尔文的影响”一文，叙述了达尔文《物种由来》等三本著作中有104处提到中国古代的贡献。现出书中一字未提达尔文如何看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生物学的贡献，因翻译同志均是动物所同人，故敢表达愚见，以供参考。

书信中提出的两点意见，一点基于学术规范，一点基于内容扩充，均有论据支撑，并非空穴来风。而这类问题在本书之后的再版中，都得到了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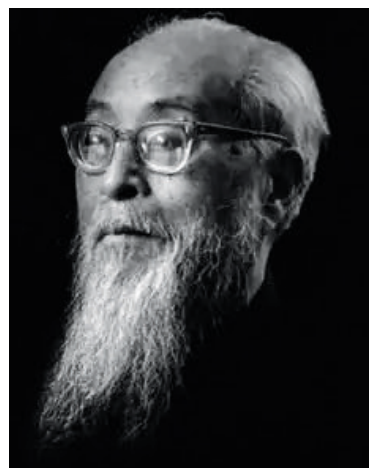
自然科学有此种争论，人文社会科学亦有。金岳霖先生作为中国哲学界的鼻祖，在写给中华书局编辑关于汪奠基所著《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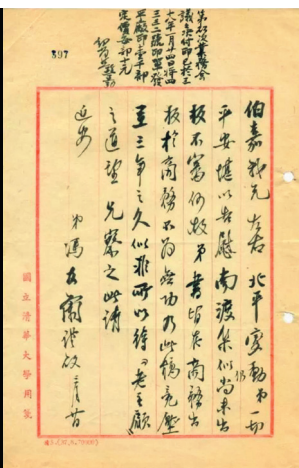
金岳霖



金岳霖的信



冯友兰



冯友兰给李伯嘉的信

析》一书的意见中这样说：

逻辑的范围非常广，逻辑史的范围也非常之广。逻辑史我就不懂，中国逻辑史我更不懂。关于它的具体内容，我没有发言权。汪先生的稿子（头一部分）曾经交给逻辑组，要组员提意见。除沈有鼎先搞过《墨经》外，其余的人没有过问过中国逻辑史，有的古文看不懂，组内的讨论组织不起来。这里当然牵扯到一些思想问题，但是上述情况大体上是事实。

中国逻辑史是一个缺口，虽然它不完全是一个空白，这门科学非发展不可。全国分散在各地的有那么几位先生，他们多懂得一些，但是他们也没有从头到尾搞过中国逻辑史。汪先生这本书印出之后，如果引起大量的争论，大量的批评，甚至相当多的批判，印发这本书就是很大的成功。几年来中国逻辑史这一关一直没有突破，如果真的有的上述的争论批评批判，这一关可能开始突破。我个人赞成把这本书付印。

在这封信寄出后不久，《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一书于1961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成为该领域开山之作。

除却学术争论，书信也向我们呈现了大师追

寻事业的途中“意料之外”的阻力。如1949年冯友兰先生写给时任商务印书馆编审的李伯嘉先生询问书稿出版事宜的信函：

伯嘉我兄左右：北平变动，弟一切平安，堪以告慰。《南渡集》似仍尚未出板（版），不审何故。弟书皆在商务出板（版），于商务不为无功。乃此稿竟压至三年之久，似非所以待“老主顾”之道，望兄察之。

信中所提《南渡集》为冯友兰先生于“九·一八”事变至1947年间所写短篇论文选集，上编收哲学论文，下编收各刊物文章，附录收友朋论文书札。这封催促出版的信函于三月二十日寄出，商务印书馆在三月三十日就给出付印答复，可见乱世之中，出版事宜还需督促。

百年间，一代代大师以书信传情言事，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素材，使今日的我们得以贴近大师们的真实生活。透过书信的吉光片羽，我们简短看过了他们的家庭、友谊、事业，这一种距离的拉近，亦是对当代人的激励。

即便是网络时代，一个个落在纸上的字，依然可以寄托最真实的情怀。✎

（转载自《清新时报》）